

◀（上接 8 版）

口本设色，画瓜一，蔓缀败叶，旁映小花，三鼠在其下，窃食之。款钱选舜举，印舜举。〔清〕胡敬撰，《西清札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一〇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钱选另一幅《黠鼠图》，朱彝尊后作跋赞其画工：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康熙甲申畅月，偶集小沧浪亭西陂，放鸭翁出钱选舜举《黠鼠图》见示，叹其工绝，翁属书，苏和仲赋于后。乙酉夏，始以八分书而归之，兼欲题诗其上未果也。〔清〕朱彝尊撰，《曝书亭书画跋》，见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541页）

此外，清鉴藏家孙承泽亦藏有元代另一位画鼠专家伯颜不花（？—1359）的《鼠图》，在其撰写的《庚子销夏记》卷八中形象地描述画中“一鼠缘木窃果，惶惶畏人，宛然如生”。〔清〕孙承泽撰，白云波、古玉清点校：《庚子销夏记》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除了宫廷与文人鼠画家外，明宣宗朱瞻基的画鼠技巧也堪称一绝。他曾绘有《苦瓜鼠图》（图6），画面左下角蹲伏着的小老鼠正眼露倦光地仰头观望着悬挂的熟透苦瓜，惟妙惟肖地尽显老鼠灵动的姿态和鼠毛的真实质感。老鼠和瓜在民间皆有多子和人丁兴旺之意，《诗经》也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之说。据《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二年）乙未，今上皇帝生，上之长子也。日下五色云见。”（《明宣宗实录》卷三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第四册，1962年，第842—843页）宣德乙未即宣德二年（1427），恰与《苦瓜鼠图》创作时间一致（画幅右上有宣宗亲题“宣德丁未，御笔戏写”），就在这一年贵妃孙氏为多年求子不得的宣宗诞下长皇子（明英宗朱祁镇），欣喜之余，宣宗翌年即废胡后改立孙氏为后。可见，宣宗绘制《瓜鼠图》的意涵应是庆贺自己鼠年顺利得子，也祈祷皇室人丁兴旺、国家昌盛富足。

《石渠随笔》记录了明宣宗另一幅与《苦瓜鼠图》共裱一卷的鼠画《石荔鼠图》（图7）：

明宣宗写生小幅。立石上有菖蒲数叶。石下平地有金钗连索锁，一小鼠方啖荔子。荔子尚大于鼠。款楷书宣德六年御笔。赐太监吴诚中。钐武英殿宝。〔清〕阮元撰：《石渠随笔

（二）》卷五，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页）

这幅是宣宗赏赐给太监吴诚的，画中一灰鼠边专注偷食红荔，边警惕地盯着前方，生怕被发现。其身后墨笔绘一块寿石，上添一簇菖蒲，与被咬破壳的巨型红荔形成色彩与形体的鲜明反差，凸显灰鼠的贪婪，可谓形神兼备。与《苦瓜鼠图》表达意涵不同的是，宣宗希望借画勉励吴诚尽心做事，多得红利（与“红荔”谐音）。

可以发现，宣宗善于捕捉老鼠灵性，从客观对象中发现审美价值，使观者忘却老鼠原本可憎的一面，这或许是宣宗鼠画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亦发挥了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宣宗后，鼠的艺术形象不断活跃于文人画家笔下，清初八大山人和海派虚谷、赵之谦、任预等皆以墨笔画鼠为趣事。

更迭与传承：鼠画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更迭，旧时的传统木版鼠年画日渐式微，引起爱国人士关注，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文人鼠画则不断融入近现代艺术的创作轨迹中，并演化成艺术家的个体精神情感，其中不乏有20世纪革新中国画的领袖人物徐悲鸿和“南张北齐”的白石山翁等。

鲁迅非常重视民间艺术，在其关于美术的言说中，在不少论著篇章和信箋中谈到民间年画对于绘画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其中还涉及民间木版年画消亡的问题：

光绪初，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梓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箋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箋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鲁迅：《北平笺谱》序，见《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19页）

这与他童年生活不无关系，当时他最感兴趣便是年画，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老鼠嫁女”题材年画。

孩提时的兴趣也直接影响了鲁迅收藏艺术作品的喜好。他的年画藏品中，有两幅“老鼠嫁女”作品，分别来自湖南邵阳滩头的木刻印



图 8
《黑猫衔鼠》



图 10-1 徐悲鸿《十二生肖之鼠》
28 × 37 厘米，纸本册页，1946 年



图 9 《神猫图》斗方，手工彩绘 54 × 40 厘米，清代，绵竹年画博物馆藏



图 10-2

年画和四川绵竹的木刻着色年画，内容极为相似，描绘母鼠生了一个俊秀女儿后，想将女儿嫁与一位无敌大英雄，找太阳、找云彩……都被拒绝了，最后嫁予猫女婿。

此外，王树村在注解鲁迅所藏的“一张贵州的花纸（新年卖给人玩的）”，说：“看它的设色法，乃是用纸版数块，各将应有某色之处镂空，压在纸上，再用某色在空处乱搽，数次而毕。”〔《致郑振铎》，见《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21页〕王树村认为：“贵阳是我国西南印制年画的产地之一，风格类似四川产品，内容有门神、魁星、鹰菊（英雄居上）、翠柏瑞兽（百寿）、黑猫衔鼠等，黑猫衔鼠还题有‘神猫奉玉帝敕令渐耳’字样，可见贵州年画与四川的关系。”（王树村：《鲁迅论“花纸”补注》，见《美术史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期，第45页）这件作品可能与笔者2018年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红红火火中国梦——中国木版年画展》所见展品《黑猫衔鼠》（图8）和绵竹年画博物馆藏《神猫图》（图9）有异曲同工之妙。《黑猫衔鼠》中老鼠形象煞是可爱，右上题“此猫甚是猛男，两眼恰似玲珑，四爪

犹如钢叉，老鼠不敢称雄”。《神猫图》则题款：“此猫如虎，取消众鼠，行走似箭，可称神武”，皆颇具讽刺意味。

徐悲鸿曾作两件生肖册页，一件根据《鼠》图题“册四年冬，悲鸿居磐溪”和《狗》题款“乙酉仲冬，悲鸿写于中国美术学院”，即创作于1945年；另一件成册于丙戌始夏，即1946年5月（图10-1，10-2）。前者是徐悲鸿与蒋碧薇离婚当日（1945年12月31日）赠予她的百幅作品中的一件。蒋碧薇曾回忆当天的情景：“徐先生到得很早，他神情颓丧，脸色苍白，手里拎着一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那里面盛着一百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自始至终，他一直低着头，四点多钟的时候，有关人士签字盖章完毕，手续告成。”（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此册页纵33厘米，横35厘米，水墨设色纸本，另有赵少昂题签“徐悲鸿先生画册”并附长跋。后者是徐悲鸿赠予当年即将游学欧洲、其颇为得意的女弟子张蓓英的。册页清楚地记录了创作时间和缘由：“蓓英弟游欧，索写十二幅，即以付之。丙戌始夏悲鸿。”册页纵28厘米，横37厘米，水墨

设色纸本，并有齐白石亲笔题签。相比较而言，蒋碧薇版册页所绘的二只老鼠略显沉闷、工细，而张蓓英版的则更为活泼，皆为徐悲鸿难得一见的作品。

以画虾著称的齐白石，对鼠画也情有独钟，还被戏称为“鼠画家”。他一生画鼠无数，笔下的老鼠形象幽默诙谐、稚拙夸张，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齐白石画鼠还经常赋诗，诗画相得益彰且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群鼠图》可为其鼠画的力作之一，题识“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何？既口齿我果，又剥我黍。烛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内容意在影射讽刺日伪汉奸。

从民间到宫廷，从乡野到都市；从承载民间信仰功能，到表现民俗生活、满足审美需求，再到成伦理、助教化，由“憎”变“崇”，鼠形象经过图像的形塑真实地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诉求。如果鼠文化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力量构成的或妥协的合力结构，那么鼠画则是蕴涵了一种雅俗兼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流的文化形态。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